

编者语：本期发表两篇以探讨明代云南文学之发展为题的概论性文章。姜晓霞教授把云南明代少数民族作家汉语诗文的创作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大致梳理了它和主流文学的关系并描述了其基本风貌，进而从中抽绎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的思想文化和文学要素；董雪莲博士以中国明末清初社会危机加深、国运日益艰难为背景，对云南部分文人学者复兴传统儒学的浪潮进行探寻和总结，以期揭示他们希望复兴儒家正统思想的时代意义，以及在此影响下这时期诗歌创作所体现的新面貌和新走向。二文各有所见，展示了昆明学院明代云南文学研究取得的新成绩。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汉语诗文创作的发展与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立

姜晓霞

(昆明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214)

摘要：云南汉语诗文创作崛起于明代，少数民族文学家为数不少并做出突出成就，他们的诗文创作可以星星闪耀、汇聚成河、川流不息三个阶段来进行描述，其汉语诗文作品中具有言志观、缘情观、教化理念、讽喻传统、载道传统、以“意境”作为诗歌审美价值评判标准等汉文学认同，倡导以“仁”学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思想文化认同，兼及忠君思想、爱国主义的国家认同等。

关键词：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汉语诗文；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639(2022)05-0079-0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2.05.011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etry Writing by the Minority Literati of Yunnan Province in Ming Dynasty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Chinese Nation

JIANG Xiaoxia

(School of Humanities, Kunming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China 650214)

Abstract: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oetry and prose in Yunnan Province rose in Ming Dynasty. In that time, many minority literati grew up and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Their poetry and prose writing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the shining stars, converging into streams and steady streams. These works endorse artistic literature concepts, including ambition, emotions, moralization, and allegory and spread of tradition, with the artistic concepts as the poetry aesthetic value criteria. These works advocate the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by learning about "benevolence" as the core idea of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complementation and compatibility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and uphold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by royalism, patriotism etc.

Key words: Ming Dynasty; Yunnan; Minority writers; Chinese poetry; Chinese Nation Community

古代云南汉语诗文创作的崛起始于明代，我们以明代以前的情况为对比，可以清楚地揭示这一点。明末刘文征撰《滇志》收入明代以前的诗歌51首，诗人40人，其中元代则有诗歌22首，诗

人19人，而仅仅有明一代，就有诗歌499首，诗人211人；清人鄂尔泰等编的《云南通志·艺文志》收录的明代以前的诗歌仅34首，诗人26人，其中元代诗歌10首，诗人9人，而明代则录有175

收稿日期：2021-10-06

作者简介：姜晓霞（1973—），女（侗族），贵州剑河人，教授，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首,诗人82人;袁嘉谷等编辑的《云南丛书》,明代以前别集为空白,明代则有18种,此后的清代才迎来汉语诗文创作更为繁荣的局面。

云南还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按照学者对古代民族的划分,明代中国主要有八类少数民族^[1],其中的回、彝、白、纳西四种民族都有较多人员在这个区域生活,具有较高显示度。各民族繁衍生息由来已久,有自身的性格秉性、文化传承,呈现多样化、复杂化特点。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存于一隅,还要归功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建立,落实到汉文学文化的认同上。我们以汉语诗文创作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对明代这一时期进行历时性考查,可以看出该时期云南包括诸多少数民族文学家在内,表现出对汉文学的接受与吸纳、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意识等情状,甚至随着少数民族精英群体在汉语诗文创作的不断增多,以个人实践、师徒传承、家族传承等形式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汉文学认同、国家认同、思想文化认同的显著特征。基于此,本文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考量。

一、明代民族关系的调适与西南边疆汉语诗文创作的发展兴盛密切相关

明王朝的移民政策使大量汉族进入云南,带来了云南社会结构的较大改变。“明代初年,云南户口只有59 576户,经200多年发展到万历初年已增至471 048户……到明代后期,各种类型的汉族移民(屯田、充军为主)的总数已达300万左右……原来土著的‘夷人’与土著化的汉族移民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帮助、相互融合形成‘云南人’。‘云南人’这个称谓的出现当不会晚于明代后期。”^[2]

科举取士也是带来云南汉语诗文创作发展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一王朝统治有意识的作为,应该是带给云南文化建设以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明朝从太祖、太宗始,十分重视发展云南教育,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云南在地方官员的主持下,大力兴教办学,推行科举。科举名额都对云南有所倾斜,云南入国子监就读的诸生,以及云南本地的廪生待遇,都得到了朝廷的格外恩典。孙秋克教授指出:“科举兴盛是明代云南文学崛起的重要契机,甚至不妨说,这一时期以汉语为载体,以诗文

为主体形式的云南文学,也是科举的间接产物。”^[3]

云南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态势良好。地处西南边陲的这个多民族聚居区域,在明代逐渐形成了取长补短、相互接受的态势。朱明王朝建立之初形成的以儒为主的施政理念在云南也反映了出来。云南巡抚郑颺在《重修云南志序》中就阐述了云南这个以险要偏远而较晚臣服的地区,经过明王朝七十余年的王朝统治、教育教化,成为“风俗丕变”“礼乐文章明备”“道德风俗同一”的“大一统寰区”^[4]。

云南汉语诗文创作兴盛于明代,这一时期它与主流文学呈合流之势。云南各少数民族文学家也在其中做出重要贡献,不少有显示度的汉语诗文创作都出于少数民族作家之手。譬如,列入《云南丛书》集部的18位云南文学家就有沐昂(回族)、禄洪(彝族)、木公(纳西族)、李元阳(白族)、杨士云(白族)、赵炳龙(白族)等重要代表,占比为30%。至于其他有诗文存世,亦有一定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文学家还有回族孙继鲁、马继龙、闪继迪、闪仲侗;彝族左正、左文臣、高裔映、高厚德、禄厚;白族何邦渐、何鸣凤、何蔚文、何星文;纳西族木青、木增、木泰、木高、木靖,等等。

二、明代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的汉语诗文创作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明代前期少数民族文学家的诗文创作可以用“星星之火、点亮滇南”来概括

这一时期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沐氏。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西平侯沐英奉命征伐,留镇云南起,至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沐氏第十四世镇守黔国公沐天波追随永历帝奔亡缅甸止,二百八十余年,沐氏世袭封爵,可谓与明代相始终。沐氏为云南的发展起重要作用^[5]。沐氏为天子筚路蓝缕,开滇土、守家国、治民众、化民风,功勋卓著。

文学创作上起到重要影响的当属沐英之子沐昂(1379—1445年),字景高,沐英仲子(一说为季子)。在其兄沐晟死后,被皇帝授予都督同知佩印代镇,死后追封定边伯。虽没有父兄的胆气武功,却一生留情文咏,因其出于勋戚之门,寄意风雅又礼贤下士,在文学创作上起到了较大影响。沐昂著

有《素轩集》十二卷，又将明朝初年流寓迁谪云南的21位诗人之作三百余篇编选为《沧海遗珠》，四库馆臣评价其“去取颇精审，所录多斐然可观”，是明初诗歌总集的善本。这些流寓云南澄江、昆明、建水、大理等地的文人用汉语诗文歌咏滇中山水、介绍滇中掌故，受到杨慎、四库馆臣的高度评价。《沧海遗珠》诗歌数量虽然有限，却为云南汉文学创作进行了铺垫，《素轩集》又是作家沐昂的文学实践，作品为情为事而歌，是直抒胸臆的作品，其对汉语诗文的传播意识和贡献可见一斑。

(二) 明代中期少数民族文学家的诗文创作可以用“光芒闪耀、各领风骚”来概括

随着贬谪状元杨慎谪滇，带动了滇中、滇西、滇南等地方的文化发展，杨门诸子交流频频，诗词唱和不绝，其中，少数民族文学家杨士云、李元阳的诗文创作成就斐然。

杨士云（1477—1554年），白族，字从龙，别号弘山，云南大理喜洲人，杨门诸子之一。弘治十四年（1501年）辛酉科云贵乡试的解元。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中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正德十四年（1519年）授工科给事中。因父亲去世返乡守孝。乡居尽孝、读书约20年。嘉靖十七年（1538年）再次入京为官。任官一年多，杨士云上书朝廷，请求致仕，得到允准。返乡之后，杨士云闭门读书，遍阅经史子集，究心诗文和学术，在天文、地理、经学、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杨士云还应大理府知府蔡绍科的聘请与李元阳一起撰修《大理府志》。^[6]杨士云一生好读书，除四书五经之外，精研易学、天文、地理、算学等书，并留下大量读书笔记，供后人学习。

杨士云现存《杨弘山先生存稿》十二卷，共有诗词千余首，文章七十余篇。其研究涵盖经史子集，著述囊括诗、文、赋、记，笔力惊人。我们以咏史论史、田园农事、交游赠答、生活小品、登临山水五个方面对杨士云的诗歌创作进行粗略的分类。发现其咏史、论史诗特别值得关注，占杨士云作品的十之六七。杨士云常常是从书本出发去写诗，他的咏史之作数量多、涉及年代长、吟咏对象广。从他的624首咏史作品看，有评论历史人物

的：包括皇帝、诸侯、大臣、谋士、将军、使者、文人，甚至是女子，如《秦始皇》《淮南王》《董仲舒》《张衡》《蔡邕》《陶潜》《沈约》《宗泽》《秦桧》《元世祖》等；有评价历史事件的：如《九鼎》《赈济录》《秦坑》《星陨化为肉》《范马论乐》《唐史》《五代史》等。这些人物，或为帝王、或为臣子、或为文人、或为后妃，的确是包罗史书中涉及的诸般人物。作家学识渊博，涉猎广泛，又往往能够通过历史人物之表现评价其是非功过，提出作家见解，显示出独特的历史见识，给人有借诗歌形式讲史、论史的印象。李东《弘山先生文集序》中说：“（杨士云）坐一小楼，探讨载籍，古今人物之繁多，天地阴阳之隐奥，无不博综而冥会作为诗文”^[7]。杨德说杨士云：“择事有可纪，人有可则可戒者，彙括成韵，以寓劝惩。”^[8]朱彝尊又说：“自春秋以来迄于元季，历代人物各咏以诗。”^[9]充分体现了杨士云借咏史论史明道、正学、抚世的精神。这些作品有明显的经世致用之目的，更多强调的是思想性，从形式上看，作家几乎尽用简短明了的七绝，又不十分强调艺术审美和形象的塑造，在对仗、押韵方面亦有所忽略。所以，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不太像诗，而像语录讲义之押韵者。杨士云的有些诗歌被我们认为是研究学问的“副产品”，或者说是以诗词形式记下来的学习心得，因此终其一生的文学创作充满了浓重的学术意味。如果把创作细分为强调性情的文人之诗和强调思辨的学者之诗的话，我们觉得杨士云的很多诗歌就表现为学者之诗的特点。作家在创作中比较注意诗歌艺术美的则是其他几个题材。

李元阳（1497—1580年），白族，字仁甫，号中溪，云南太和（今大理）人，明代云南著名士人，因世居大理点苍山十八溪中，又有“十八溪”之号。嘉靖五年（1526年）中进士，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之后，历任分宜知县、江阴知县、户部主事、江西道监察御史、荆州知府等职。嘉靖二十年（1541年）李元阳因父亲去世，回乡守孝，从此不涉官场。后半生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读书、优游山水、与文人僧侣交往唱和、捐资兴建寺观庙宇、从事儒学理论研究及救患乡里、教授学生等事情上。李元阳一生政绩卓著、交游广泛、学生无数，明朝著名首辅大臣张居正都自称是他的学生，

可谓明代中叶极具传奇性的名宦，在云南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在大理，至今为人称颂。

李元阳有生之年学术上的着力点是在理学、地理学、历史学方面，这方面的影响力在当时也更大，但他也有较高的诗文创作成就。《中溪家传汇稿》中共存诗844首，古近体皆有（五言律162首，五言排律45首，五言古诗123首，七律238首，七绝162首，七古114首），从内容上看，比较多的是他返乡后的作品，集中在朋友间的赠答、山水景物的描绘、触物感怀等方面，其中也有少量为感叹实事和咏史的内容。出语率真自然，大多通达明快。学者评论其有白香山、苏东坡之风。李元阳的山水散文清新秀丽，在明代游记中占有一席之地。

杨士云、李元阳这一类有较高学术底蕴和文化影响力的少数民族作家，用一定体量和质量的汉语诗文创作影响了明代中叶的云南文学，他们用文学进行讽喻、载道、教化，影响了云南地方文化与思想的走向，更有甚者，他们作为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文化精英，作为“经师”和“诗人”的文化符号效应，让我们看到明代中叶云南少数民族汉语诗文创作又上了一个台阶。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诗文创作从诗文创作行为本身和作品内容两方面彰显、引导、宣传了中华文化认同。

（三）明代后期少数民族文学家的诗文成就可以用“家族承传、蔚然成风”来概括

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汉语诗文创作在该时期发展为家族承传式，其规模不断壮大起来。白族何氏家族、纳西木氏家族、彝族土司禄氏父子的诗文创作和传代继承都表现出这一特点。

大理白族何氏家族作为明代云南著名的少数民族文学世家，从明代嘉靖时期至清代初期的五代，先后出现了四位举人、五位贡生。该家族成员好学尚文，代代相继，在文学上各有建树，均有佳作流传，被称为“一门五代六诗人”^[10]。具体而言，即一世何思明，二世何邦渐，三世何鸣凤，四世何星文、何蔚文，五世何素珩。该家族在南明时期生活的第四代诗人何蔚文是其中的佼佼者。何蔚文（1625—1699年），字稚元，一说稚玄，浪穹人（今大理洱源县），他曾中永历朝丁酉科（1657年）乡试第二，但因处在明清易代的乱世，未能在政治

上一展所长，只能与兄长何星文隐居家乡宁湖，以文学自娱。何蔚文存世的作品有诗、词、文、赋，其中诗歌最多，《浪楂集》除存《耆古堂赋》一篇外，其余均为诗，由他的八世孙潘问山辑录，共有诗歌124首。《滇南诗略》《滇诗拾遗补》收录了他的诗歌40首，部分超出了《浪楂集》所收之内容。这些作品古近体皆备，长篇短制不乏佳作。内容均出之于真情，出之于生活。艺术风格有崇尚古朴、讲求趣味和以诗讽世的特点。《滇南诗略》卷十引颐园先生评语：“何稚元学有渊源，而才情恣肆。发为诗歌，其古今各体，有时而沉郁顿挫，险绝为工；有时而古拙渊深，自然潇洒；有时而隽永清新，诙谐成趣。所谓残膏剩馥，沾丐后人。”^{[11]198}又引肖森语曰：“其诗品宜位置担当上，余子不及也。”^{[11]201}对何蔚文诗歌创作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进行了高度评价。

何蔚文的诗文创作、入世情怀及乱世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对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文化认同。何氏家族其他文人，何思明嘉靖年间举于乡，先后做过知州、通判等官职，归家后树立了好学不倦的家风；何邦渐也做过官，返乡后以“乐善好施、倡修学宫、武庙”和“修撰地方志”闻名，著有《初知稿》；何鸣凤，字巢阿，万历（1615年）乙卯举人，先后做过四川郫县知县、安徽六安知州，在任期间做了很多安抚百姓、振兴文教、抵御流寇的事，建树颇丰，甚至于六安百姓为他建立生祠，离任五十年，还被录入六安名宦传，著有《半留亭稿》《嵩寮集》；何星文撰有《道德经赞颂》《何氏琴谱》；何素衍（字尚白）读书自娱，无志进取，亦作诗歌。以上诸人均有诗歌传世。这种以文学家族形式存在于云南的少数民族作家群，在家，他们学习汉文化，多以汉族文人为师友；出外，他们参加科举考试，扩大了交往见闻。和汉族座师、同年友好往来，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其诗文创作谙熟儒汉文化，表现出少数民族主动融入中华文化的特点，对于少数民族文人融入汉文化的重要作用不言自明。

纳西族土司木公对汉文学的关注与热爱也是少数民族热爱云南汉语诗文创作的明证。木公（1494—1553年），字恕卿，号雪山，又号万松，作为丽江土知府，不用参加科考，无须谙熟汉语诗

文，然而聪颖好学的他，不仅旁通吐蕃、白蛮之书，还钟情于汉语诗文创作。他与嘉靖年间进入云南的贬谪状元杨慎及其周围跟从其学习、相互间进行诗文唱和的诸多云南士子如张含、李元阳等人多有文学交游，在自己的木氏府万卷楼里收藏了数万计汉文书籍，手抄王、孟、高、岑等名家诗作，自己也倾心创作汉语诗文，有《雪山诗选》传世。杨慎、张志淳、张含、张合、李元阳等文人都以序言或诗文赠答的形式评价过木公的诗文。譬如，木公曾写《高峽十二景诗》，其后就有杨慎的点评，或云“绘景好”“绘意好，”或云“用字佳”、意境“秀出”^[12]。

丽江土知府木氏一门，在木公之后又出现了木青、木增、木泰等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载录了木公、木青两人。作为有明一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可见丽江木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与木氏历来对汉文化的重视密切相关。木氏后人木青、木增均有诗文集存世，分别与中原文学家杨慎、徐霞客，地方文学家张含、李元阳等有文学交游。作为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知府和少数民族诗人，他们与当地汉族文人抑或是走出云南参加了科举的其他少数民族文人都有所不同。他们对汉文学的热爱更多的是出于汉文化认同。

宁安府宁州（今华宁县）彝族土知府禄厚、禄洪父子，也有诗名。禄厚（？—约1621年），著有《景竹斋躬耕集》，如今散佚，在《宁州志》中仅存3首，但他喜好汉语诗文创作，常与儿子相唱和。禄洪（？—约1633年），字霄宾，作为禄厚次子世袭土知府。著有《北征集》，作品记载了明王朝末期，皇太极直逼北京，京师告急，禄洪受崇祯帝朱由检征召，将兵勤王事件及所观所感。《北征集》中的诗歌写得真切、悲壮，董其昌、陈继儒两位与之交往较深的大儒给予了高度评价，陈继儒在《序》中谈及禄洪“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三河豪杰，五陵俊人，庶几足以当之”。该作品在艺术风格上深得汉语诗文战争写实之作悲壮沉郁之精髓，在内容上谈及“君父有警，臣子安能束手坐观？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观念，表现出少数民族文学家对王朝国家的认同意识。

少数民族文学家族表现出来的优秀文明成果的相互吸收、相互认同，共同性因素不断增加，对国

家认同的不断增强等，共同创建了中华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人对汉语诗文的接受、参与并成就斐然的发展过程，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有力体现。认识这一过程并探寻其原因可以为进一步探讨共同创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服务，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的新进展提供借鉴。

三、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创作中体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第一，科举取士在云南边疆的迅速扩张，对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具有重要作用。该制度对各族应试人士一视同仁，吸引大量少数民族文化精英投入科举考试，并借此机缘迅速融入传统士大夫群体。该群体成员之间互促互进、共同发展西南边陲的汉文学。其诗文创作谙熟儒汉文化，促进了传统价值观与儒汉文化在本土的传播。

第二，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知府和少数民族作家中为数不少的隐士，对汉文学的热爱更多的是出于汉文化思想价值认同。他们的诗文创作无关仕途、荣身，但儒学教育在他们身上产生的影响直指生活情趣、审美好尚和价值理念，其文学成就不可低估。

第三，明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影响力大小因仕宦经历、家族传承、交流多寡、时代风尚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呈现出高低不同。在“出仕”“隐逸”“土司”“遗民”“入籍云南”等多个作家类型中均有文学成就不可低估者。

第四，明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的汉语诗文创作至少可以从诗文创本身和作品内容两方面彰显、引导、宣传中华文化认同。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文学成就体现了本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华民族“天下一家”的民族共同意识等精神力量使得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交融共生。

第五，由明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传统诗文创作历时性发展来看，从一人发展到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甚至整个云南，迅速提高了少数民族汉文学作家的体量和创作水平。具体由明代初期对汉文学及文化的引入、模拟、效仿的初步关注，到明代中叶培养出逐鹿中原、声名显赫、文史哲兼通的少数民族大家级人物，发展到明代后期，出现了以汉语诗文创作为好尚的少数民族家族团体。

第六,明代云南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的中华文化认同,极大地引领了本民族聚居区的中华文化认同。

总之,明代是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的关键时期。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精英的汉文学创作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源远流长定义,其具体可分成星星闪耀、汇聚成河、川流不息三个阶段,换句话说,就是从一些各自闪闪发光的诗人,发展到出现影响当地文风的著名文人,继而出现以汉文学见长的少数民族家族群体,影响日渐扩大。这一趋势,带来了清代少数民族精英汉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的另一轮洪流。

明代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家的汉语诗文作品中具有的言志观、缘情观、教化理念、讽喻传统、载道传统、以“意境”作为诗歌审美价值评判标准等汉文学认同,倡导以“仁”学思想为核心理念的思想文化认同,兼及忠君思想、爱国主义的国家认同等均有体现。这些大量进行汉语诗文创作且卓有成就影响地方思想文化发展进程的少数民族文学精英,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文化符号,为共同创造伟大中华民族文化不朽精神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 [1] 多洛肯. 元明清少数民族汉语文创作诗文叙录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 [2] 林超民. 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 [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106-113.
- [3] 孙秋克. 明代云南文学研究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4.
- [4] 刘文征. (天启) 滇志: 卷24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1: 800.
- [5] 辛发春. 明沐氏与中国云南之开发 [M]. 台北: 文史哲出版社, 1985: 1.
- [6] 李元阳. 李元阳集: 散文卷 [M]. 施利卓, 编校.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8: 220.
- [7] 张培爵, 周宗麟. 大理县志稿: 卷27 [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4: 1376.
- [8] 杨士云. 杨弘山先生存稿序 [M] //丛书集成续编: 第114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665.
- [9] 朱彝尊. 静志居诗话: 上册 [M]. 姚祖恩, 编; 黄君坦, 校.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295.
- [10] 云南省洱源县志编纂委员会. 洱源县志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6: 670-714.
- [11] 袁文典, 袁文揆. 滇南诗略 [M] //丛书集成续编: 第150册. 上海: 上海书店, 1994.
- [12] 木公. 雪山诗选: 卷下 [M] //丛书集成续编: 第169册. 台北: 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9: 730

